

习近平经济思想标识性概念研究

# 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林建华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

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标识性概念,概括提出并持续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以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系统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问题,继续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 实践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和不懈探索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19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由机械化转向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20世纪中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孕育了由电气化转向信息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加快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历史的坐标系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进行的现代化尝试和探索,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驶入“快车道”。

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是历史的“接力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已经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逻辑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实现了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使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伟大成就。

##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全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过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等问题,丰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现代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生活于19世纪的德国、法国、英国等。那里是资产阶级革命较早发生和资本主义制度最早确立的地方,是现代化进程最先开启的地方,也是社会生产力最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最快速积累和社会弊端、社会矛盾最充分暴露的地方。关于未来社会,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即为人类求解放,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2023年2月7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发展的条件”的未来社会。关于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与现代化的科学意涵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但是他们的思想中内蕴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方向和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当今世界上难度最大的现代化,构成了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概括,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既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使中国式现代化逐步进入“自由王国”。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世界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今天,智能化、数字化趋势日益彰显,孕育和发展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现代化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速度、广度、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一系列现代化之问考验着世界各国的战略定力和战略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

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和正道,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这意味着现代化从来不是“单选题”,意味着现代化建设从来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意味着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不同、文化传统不同、道路选择不同,现代化模式也不尽相同,并非要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简单模仿。纵观各国的现代化历程,一些国家盲目照搬或被迫接受西方模式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

进一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意义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既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又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为现代化注入了新的内涵,赋予了新的精神,开辟了新的境界。

一方面,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约为10亿人,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支持世界各国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探索为世界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委书记)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越是深入发展,越要努力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牢牢掌握科技竞争主动权。随着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已经成为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方面。“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这对进一步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了要求。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复杂系统,既包括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创新主体,又涵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等创新环节,还包含人才、资本、数据等各类创新要素,同时也涉及创新机制和环境。这一复杂系统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可以理解为国家创新体系内各主体、各环节、各要素协同互动、顺畅衔接、高效配置所形成的促进新技术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的系统集成能力建设。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一技术、单一产品的比拼,演变为创新体系之间的竞争,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较量。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有相关动作。例如,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系统强化国家创新架构;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旗舰科学项目“地平线欧洲”计划的第二个战略规划,旨在为2025年至2027年欧盟的研究和创新制定战略方向并提供资金。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科研范式和研究方法面临变化,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以及迭代突破的效率将大幅提升,知识获取的门槛将显著降低,技术外溢和创新扩散的速度将空前加快。在此背景下,单一技术以及单一领域的突破已不足以支撑科技竞争的全面领先,唯有显著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才能在前沿技术“无人区”率先突围、在未来产业新赛道抢占先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0.8%,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九位。同时也要看到,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科研选题与市场需求脱节现象依然存在;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中的“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机制尚不健全,人才培养和创新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区域创新格局有待优化,一些地方存在创新资源重复布局、同质化竞争现象;科技管理体制机制仍需完善,还存在评价体系、激励机制、经费管理等与科技创新规律不完全适应的问题。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关键跃升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了从“支撑”到“引领”的更高要求。未来产业的培育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验证、市场应用的全链条协同和体系化攻关,这恰恰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直接体现。如果不能及时主动解决这些问题,在体系效能上有所突破,不仅会拉大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差距,还可能在新兴领域被“卡脖子”、“新赛道”上遭遇封锁。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精准施策、系统推进。

一是提升知识流动的畅通性。建强技术转移体系,加大力度培育专业化技术经纪人队伍。支持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场景实验室,帮助创新成果跨越“死亡之谷”,推动基础研究的突破能够快速被应用研究承接,实验室成果能够顺畅进入中试和产业化通道。

二是加强创新主体的协同性。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持续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鼓励企业发挥“出题人”作用,从产业需求出发牵引高校院所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攻关。促进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能够接力支持硬科技成长,发挥科创板、创业板的作用,畅通科技型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为企业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三是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布局下一代信息技术、未来能源、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相关学科,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加大对人的投入力度,注重培养既懂技术又懂产业、既懂研发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全面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畅通科技人员在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双向流动的渠道。

四是拓展创新体系的开放性。发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创新格局。加强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鼓励探索更加灵活的“反向孵化”和“创新飞地”合作机制,推动创新资源向欠发达地区流动。

五是强化要素配置的精准性。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推动科技计划项目、科研经费、科技基础设施等资源向重点领域、重点团队、重点平台集聚。针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技术快速迭代的特点,探索建立更加灵活、更具弹性的项目管理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突出国家战略导向、实际贡献和创新价值,引导各类创新主体聚焦主责主业、潜心攻关突破。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 破解结构性矛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吴卫星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我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就业问题的关注点已从相对单纯的“总量供给”转向“结构匹配”和“形态重塑”。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健康稳定增长,随着产业升级加速、技术冲击深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就业市场呈现出“高技能人才短缺和低技能劳动者过剩并存”的结构性失衡,“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一些重点群体就业压力突出。下一步,应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坚持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短期以稳定重点群体就业、缓解技术替代压力为切入点,长期以制度创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为重点,多措并举防范就业领域风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先后突破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以5.4%的年均增速继续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就业总量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随着经济结构深入调整,产业升级与就业规模扩张的协同性不断增强,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数字经济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约50%。当前,我国就业大盘保持稳定,但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在客观上促使我们更加注重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产能力、消费潜力。我国人口结构呈

现老龄化、少子化等特征,虽然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但适龄劳动人口占比有所下降。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必须主要依靠要素规模扩张逐步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带动,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即更依赖于创新驱动和人力资本质量提升。这些情况反映到就业市场,体现为劳动力供给总量面临收缩压力,同时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又催生了对高技能人才的强劲需求。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但具原始创新能力的才和有将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能力的技术工程师缺口依然较大。

另一方面,技术变革加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就业格局变化。有调查显示,当前全球有约40%的岗位会受人工智能冲击,尤其在金融、编程、翻译等领域。有报告预测,从2025年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技术的趋势将导致约900万个工作岗位被替代。

与此同时,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以及推动产业升级进程中,外向型企业从面向国际市场到面向国内市场的转型也面临挑战。这类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低端制造等领域,转型中部分低技能岗位可能面临缩减。国内市场对高端制造、数字技能的需求攀升,而这些企业的原有从业人员难以快速适配,也可能导致结构性失业。

为更好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进一步研判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对就业的深刻影响,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破

解结构性矛盾,推进科技进步和就业创造良性互动。

一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构建适应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岗位创造相关机制。培育内需驱动的就就业增长点,强化就业优先导向,重点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中小微企业发展。合理引导资本流向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硬科技领域,通过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创造更多适合不同技能层次的就业岗位。加强对产业政策的就业影响评估,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把握科技进步方向时,前置评估其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内外贸一体化过程中,通过适度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传统加工贸易企业品牌化、数字化转型,稳住存量岗位,创造更多新型工作岗位。加强对新就业形态人员的保障,完善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基本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

二是推进适应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者的技能培养。构建需求驱动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人才供需错配现象,深化产教融合,加快新职业标准开发,引导高等院校专业设置向人才紧缺领域倾斜。面向可能受到冲击的低技能劳动者,可考虑建立技能再投资专项基金,通过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和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或数字服务领域的专业技能跨越。关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通过多种方式加强职业生涯引导,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三是建立技术变革缓冲机制,实现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就业稳定的良性互动。为技术替代提供转型缓冲,借鉴国际经验,在医疗、教育、金融等关键领域设立人工智能决策的人工复核环节。鼓励企业通过“人机协同”推动系统性数字化转型,倡导利用人工智能增强人类能力而非简单地用机器人替代人。

四是深化户籍、社保等关键领域制度改革,促进劳动者有序顺畅流动。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着力打通制约劳动力、人才流动的“最后一公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加快实现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与人们的实际居住地挂钩,让更多人“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同时,推动社会保险关系顺畅转移接续,降低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成本。

五是完善覆盖城乡的就业统计监测体系,消除新业态监管“盲区”。针对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应加快从传统的职工人数统计向劳动就业统计转型。建立人社部门和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实时对接机制,将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实时监控体系。可考虑建立以工时、收入等为重点的指标,实现对新业态就业质量的精准监管。同时,探索建立相关制度,为灵活就业劳动者提供动态的职业伤害保障和建立精准培训推送机制。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